

万历《贵州通志·艺文志》论略^①

◆ 薛 雪^②

摘要：万历《贵州通志·艺文志》的编纂，秉持“文以载道”的传统观念，在体例设置上亦呈现出较强的文体意识。该志旨在反映贵州文事盛况，并遵循“首取风化，次重纪胜”的选录标准，故志中作品内容存在明显的倾向性，在保留大量诗文作品的同时，又以独特的文人视角展现出黔地之自然状况与人文风情，反映出黔地的学术传承与文化发展状况，对贵州地域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和文化意义。

关键词：万历《贵州通志·艺文志》 诗歌 黔地风貌

明万历《贵州通志》共二十四卷，现仅存日本东京尊经阁藏明刻本一部，是为海内孤本，后《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》《贵州历代方志集成》皆有影印出版，现又有贵州大学出版社^③和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^④整理的点校本。该志成书于明万历二十五年（1597年，丁酉年），故又称“丁酉

① 本文为贵州省社会科学院2023年重点培育学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，项目编号：ZDPYXK202304。

② 薛雪：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，文学博士，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戏剧史、明代文学史。

③ 许一德等纂：《万历《贵州通志》》，黄富源点校，贵阳：贵州大学出版社，2010年。

④ 许一德等纂：《万历《贵州通志》》，赵平略，吴家宽点校，成都：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，2021年。



志”，是现今流传的七部明代所修贵州地方志之一。书前有巡按贵州监察御史应朝卿、贵州巡抚江东之及邹元标三人之序。正如江东之序中所述，“志自嘉靖癸丑以后阙焉未续”^①，相较于嘉靖《贵州通志》，万历志增续了明嘉靖末年至万历中叶40余年间的文献材料和历史资料，搜集材料涉及贵州经济、文化、军事等领域，具有重要的文献及史料价值。

目前关于万历《贵州通志》的研究仍呈薄弱之势，前期成果多偏重版本来源和体例考述，如谢国桢《简介明万历刻本重修〈贵州通志〉》^②、魏治臻《谈明万历〈贵州通志〉》^③、刘泳唐《明万历贵州通志述略》^④等，仅有权春燕《明代贵州的列女现象——以明万历〈贵州通志〉为中心的考察》^⑤选取该志为考察对象，分析了明代列女的表现及特点。故针对万历志书中内容的考证和分析，仍有极大的发掘空间。

方志中的《艺文志》记录大量当地诗文辞赋和典籍著述之情况，是一地之文化面貌的重要载体。万历《贵州通志·艺文志》就保留下大量文人学者的散文、诗歌等作品，以独特的文人视角揭示着黔地之自然状况与人文风情，是研究贵州历史文化生态的重要材料。本文以万历《贵州通志·艺文志》为考察对象，基于编纂者的选录观念，从所录作家及作品的整体情况着手，辨析其思想内容与创作倾向，发掘其中呈现的黔地文化特征。

一、万历《贵州通志·艺文志》的编纂理念与体例特征

万历《贵州通志·艺文志》共四卷，关于其编纂背景，志前小序有言：

① 万历《贵州通志·重修贵州通志序》，《贵州历代方志集成》第二册，北京：中国文史出版社，2016年，第12页。

② 谢国桢：《简介明万历刻本重修〈贵州通志〉》，《民族研究》1980年第3期。

③ 魏治臻：《谈明万历〈贵州通志〉》，《文献》1981年第7期。

④ 刘泳唐：《明万历贵州通志述略》，《贵州文史丛刊》1990年第2期。

⑤ 权春燕：《明代贵州的列女现象——以明万历〈贵州通志〉为中心的考察》，《四川民族学院学报》2021年第4期。

刘勰曰：“文，人心生也。”夫文由心生，则弥纶天地，黼藻今古，彪炳万汇，靡匪是物，而可概以雕虫之技小之乎？黔之初结绳而治，浑浑噩噩已耳。至于今而郁郁乎文矣。名公巨卿，以服官任职，宣泄王猷；旅客羁臣，以吊古怀忠，发摅性术，书之缃素，西南天地蔚然有光焉。若乃驰神艺苑之场，蜚声述作之圃，言能载道，词可为经，如近时一二产于其土者，即海内能言之士，且为推轂，吾安能不纪之，以昭熙朝文治之盛哉！作艺文志。^①

不难看出，序言秉持“文以载道”的传统观念，先充分肯定了文学的重要地位和功用，进而指出有明以来贵州文学蜚声海内，并对当时黔地文学兴盛之况大加感叹。虽难免掺杂夸浮之词，仍可窥见在职官、旅客等外来文士的交流影响之下，明中叶贵州文化已有突破性发展，整体呈上升之势，编纂此艺文志的目的即为昭显贵州文学创作的成就。

基于反映贵州文事盛况的初衷，修志者又于《凡例》中提及《艺文志》选收作品的具体标准：“《艺文》首取有关于风化，次则足为黔中纪胜者录之，余无当者，虽工不录。”^②一则与序言“言能载道，词可为经”相呼应，将思想教化视为选录作品的首要条件，并且内容上看重对黔地风貌的刻画；二则表明思想和内容是凌驾于作品艺术水平之上的，并不将文学性的审美标准作为选判的依据。

就作家构成来看，志中选录的作者主要分为地方官员、宦游作家、本土文人三类。其中“文类”所选皆为明代作品，尤以地方官员为重，多收录有关仕宦见闻、政事述职的作品。“诗类”则涵盖唐、明两朝作品，尤以明代为重，编订基本以时间为序，共著录103位诗人的作品247首，除《赤虺河行》一首外皆标明著者。唐代多选李白、杜甫之流的大家名作，明代作者则多为外来任职的官员，少部分为黔籍举子生员。明人诗中所收作品数量排在前三位是吴国伦、王守仁和杨慎。此三子者，在当时既有名望又兼文才，且

① 万历《贵州通志》卷二十一，《贵州历代方志集成》第二册，第483页。

② 万历《贵州通志·凡例》，《贵州历代方志集成》第二册，第18页。

对贵州文化发展有着重要影响。

又，从编纂体例来看，万历志呈现出较强的文体意识，更近文选的性质。其类目设置和编排顺序如下：记（题名类、簠序类、祠院类、建修类、亭馆类、胜迹类、纪功类、杂纪类）、传、序、解、赞、引、书、文、檄、疏、跋、语、铭、诗（五古、七古、排律、五律、七律、五绝、六绝、七绝）、赋、颂、歌、行、谣、书籍录。姑从类目设置来看，可以说不同的文体类别都明显对编纂理念有所贯彻。如记中开列“簠序类”，尽述明代贵州兴建学院，弘扬儒教之事迹，又列“胜概类”专记黔中山水名胜；再联系作品内容来看，传类所录大半是为表彰烈女节妇之作，诗类则几乎为吟咏黔地风土人情的作品。

这种依照文体分门别类的方式，无疑为读者提供了更多便利，尤其与嘉靖志相比较，万历志便于检索的同时，又能突出各类文体的特性，于体例上有所精进。以“诗类”为例，嘉靖志仍与志书整体的分类方式一脉相承，以地域和行政区划作为归类的准则，而万历志则按诗体分类相从，即先依照古体、近体之分依次排序，又按五言、七言的句式之别罗列。而如此细致的分类编排，一方面，直观呈现出明代贵州文学创作的多样性；另一方面，切实反映了当时文体学的发展成就，也从侧面揭示了贵州文学与中土主流文学的逐步接洽。其后贵州方志的“艺文志”编撰，如康熙《贵州通志》、乾隆《贵州通志》也基本遵循依照文体分类收录全文的方式，或可见万历志影响之深远。

二、万历《贵州通志·艺文志》的地域特征

地域性是一地方志最典型和本质的特征，《艺文志》作为方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划定了明确的空间概念，详尽记载一地之文献状况，亦反映着特定的地域文化。同时，风俗人情之差异，往往为文学创作带来深刻影响，无论是本土人士还是外来文人，都通过文学创作充分表达着他们对黔地的所思所感，因而在“首取风化，次重纪胜”标准之下，志中选录作品内容一方面

存在明显的倾向性，另一方面也呈现出浓郁的地方风情。

在志中选录的“文类”作品里，既能看到王守仁《月潭寺公馆记》中“天下之山，萃于云贵，连亘万里，际天无极……素不知有山水之游者，亦皆徘徊顾盼，相与延恋而不忍去，则兹岩之胜，盖不言可知矣”^①的描绘，对贵州引人入胜的自然山水风光毫不吝惜溢美之词；又常见到类似钱钱《新添惠政桥记》“予惟贵州去京师万里，声教百年，革夷而华，关梁道路，如砥如矢，固我圣祖神宗德化渐摩之深，而前后抚镇诸公匡直辅翼，亦不为无助”^②的表述，展示贵州文教之渐兴，意在打破“长期”以来对黔地穷山恶水、蒙昧不化的偏见，表明弘扬贵州文化的立场与决心。

又，以万历志中“诗类”为例，大量作品就展示着文人墨客对黔境地理环境、风土人情的刻画，也是艺文志展露其地域性最鲜明的部分，现按所录诗歌内容可分为寄赠类、感怀类和咏景类三种。

首先，寄赠类是所录作品中情感表现最直接、思想意蕴最丰富的部分，诗人对朋友、家人或同僚表达思念和祝福的同时，也寄寓着个人丰富的思想情感，极富人情味。万历志所选录的该类诗歌大多为名家经典之作，相关情况如下表所示：

序号	朝代	作者	题目	诗体
1	唐	李白	流夜郎永华寺寄浔阳郡官	五古
2	唐	李白	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	五古
3	唐	杜甫	寄李十二白二十韵	五古
4	唐	刘长卿	送何时郎黔中判官 ^③	五古
5	明	杨慎 ^④	圣泉篇赠韩石溪	五古
6	唐	李白	留夜郎赠辛判官	七古

① 万历《贵州通志·艺文志》卷二十二，第544页。

② 同上书，第538页。

③ 按：此诗题名考《全唐诗》等书皆作“送侯御赴黔中充判官”，疑志书所录有误，待考。

④ 按：原书作“巡抚徐问”，但嘉靖《贵州通志》、乾隆《贵州通志》卷四四均作“杨慎”。又杨慎《升庵集》卷二十二收录《圣泉篇赠韩石溪》一篇，故此处应是万历《贵州通志》著录之误，应改作“杨慎”。



续表

序号	朝代	作者	题目	诗体
7	明	陈来	送焦维章督学贵州	七古
8	明	张翀	赠石南溪总戎	五律
9	明	戴乾	赠王司空凯还	七律
10	明	戴乾	赠记功黄鸣玉道光	七律
11	明	王守仁	给书诸学	七律
12	明	张佑	送杨巡抚出师征镇筧	七律
13	明	祁顺	登楼寄友	七律
14	明	林同	送祁知府	七律
15	明	杨慎	送熊经藩之婺川	七律
16	明	赵大佑	复沈总兵	七律
17	明	杨名	送谢东山督学贵州	七律
18	明	谢东山	寄曾少岷、杨升庵、朱南谷诸老	七律
19	明	蒋信	留别贵阳诸子	七律
20	明	蒋信	又别贵阳诸子	七律
21	明	吴国伦	车毕节简沈从善兵宪	七律
22	明	冯时可	都匀道中口号赠夏逸人	七律
23	明	倪岳	送熊宗德知思州府	七律
24	明	俞雄	送熊宗德知思州府	七律
25	明	王训	东山高隐赠陈明府	七律
26	唐	张文昌	送客	五绝
27	唐	权德舆	送人赴黔中	七绝
28	唐	李白	赠王昌龄	七绝
29	明	陈献章	寄祁致和知府	七绝
30	明	杨慎	曲溪山阁留别李曲溪子	七绝

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，大量作品都着力于对黔地风土人情的书写，如唐人张文昌《送客》“江连恶溪险，山绕夜郎城”^①、刘长卿《送何时郎黔中判官》中的“地远官无法，山深俗易淳”^②，又如明代戴乾《赠王司空凯还》

① 万历《贵州通志·艺文志》卷二十四，第636页。

② 同上书，第614页。

“风力扫空消瘴雾，天瓢行雨洗腥膻”、杨慎《圣泉篇赠韩石溪》“迷路鬼方雾，蕴真罗甸烟”。不难发现，诸如“荒烟”“瘴疔”“愁思”等词高频出现，而像陈来《送焦维章督学贵州》“南去南中烟雾多，五溪徭獠充山阿。禹王文教故不迄，至今学士半诸罗”^①使用的“徭獠”“诸罗”两词仍是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蔑称。

但这类作品大多为“未履其地，自抒己怀”，充分呈现出他者视角下的贵州印象，所谓的民俗异殊、蛮烟瘴雨，也几乎构成了外界人士对蛮夷地区地理景观的共识。因此，不少作者在诗中表述的黔地想象，正由于并未亲临黔地，故存在明显的“间隔”与“疏离”感。在他们视角中，作为流放之地存在的“夜郎”，充满了仕途不顺、抱负未展的郁闷和不得意，故在他们所写的诗中，西南一隅就被屡屡刻画为烟瘴险峻之处，从中不免流露出中土主流文人对相对落后的边省地区的偏见与误解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正所谓“诗穷而后工”，相关诗作具有较高的创作技巧和艺术表现力，不少亦成为历代传唱的佳篇。

其次，感怀类诗歌主要为宦游文人的即事感怀，如邹元标《龙山次司松滋见慰》所言“迁客从来多胜迹，可能携手赋愚溪”^②。诗人触景生情、遇事有感，借由文字抒发个人思考与感慨。其中最典型的便是王守仁谪黔时期的数首诗作，这些作品皆收入王阳明嘉靖三年（1524年）刊刻的《居夷集》中，被此艺文志选录甚多，如《过七盘岭》“境多奇崛非吾土，时可淹留是谪官。犹记边烽传羽檄，近闻苗俗化衣冠”^③，《清平卫即事》“烟际卉衣窥绝栈（原文自注：时土苗方仇杀），峰头戍角隐孤城。华夷节制严冠履，漫说殊方列省卿”^④。二首皆为王守仁正德丁卯年（1507年）赴谪时所作，试观诗歌的内容描述，前者因恶劣的自然环境、行路所见的殊异苍凉之景而心生悲切，后者则因见到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情形而思及遥远的故乡。

① 万历《贵州通志·艺文志》卷二十四，第616页。

② 同上书，第631页。

③ 同上书，第624页。

④ 同上书，第614页。



又如定居龙场后所作的《龙冈新构》所写：“凿巖薤林条，小构自成趣。开窗入远峰，架扉出深树。”^①面对同样的山水景色，已然呈现怡然洒脱的姿态。可见，异地的山川民俗、风烟岚雨正是其写作的绝佳素材，以诗的形式既生动展现了贵州独特的山水、人文风情，具备鲜明的地域性；又能窥见王守仁从外来入黔者到内部居住者的心态变化，即从初来黔地时对此蛮荒之地的排斥，到定居龙场后静悟其道的自得和宽慰。这些都能于其他外籍来黔官员身上产生共鸣，因此相较于完全他者视角下偏狭的黔地印象，感怀类诗歌因有亲身经历加持而稍显客观，是为贵州文化发展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。

最后，咏景类诗歌多为外籍官员写意山水或记述宦游见闻之作，重在对黔地自然状况和风景名胜的刻画，亦是《艺文志》地域特性表现最为直观的部分。在此特定地理环境之下的诗歌创作，或是“悬崖能阁木，怪石惯栖云”“逼霄峻岭万重山，悬崖瀑布垂千尺”，尽显黔中绝巖险峰，瀑布激流，山川奇崛而挺秀之姿；或是“岚深只说山无路，林静还闻水有声”“风高绝徼无来雁，雾隐深崖有避豺”，详述蛮境、边地的幽玄深邃之感。

可见，与中原风貌大相径庭的黔地风光与蛮风夷俗，带来的不是荒凉鄙陋的怅然，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新鲜体验和感受。正是在这批文人亲履黔地之后，文学创作也跳脱出了早期固化的落后印象和轻贱意识，寄情山水为他们的宦游生活带来不少慰藉，相应地，黔中大地在诗人的笔下亦脱离蒙蔽之感，进一步彰显出独特的自然及人文魅力。

综上所述，一方面，伴随着贵州对主流文化圈层的不断融入，诗人们对待贵州的态度经历着由排斥到欣赏的过程，他们笔下的黔中大地也经历着从蛮荒之境到奇山秀水的变化；另一方面，“万历志”的编者并不避讳表现黔地的疏离与闭塞之态，正是通过《艺文志》对各类作品的选录，从不同侧面展现出文学作品中贵州更为丰富而立体的地域特性。

① 万历《贵州通志·艺文志》卷二十四，第624页。

三、万历《贵州通志·艺文志》的文化意蕴与史料价值

“万历志”的修纂兼采弘治《贵州图经新志》和嘉靖《贵州通志》，又以他省志为参考，内容翔实、条例清晰，“标志着贵州方志在修纂上已进入成熟发展阶段”^①。而凡例所称“末纪书目以存典籍，演夷字以引之同文，凡皆旧志所未备者”^②。在艺文志中不仅留存大量不见于正史的原始文献资料，其独有的《夷字演》部分，将彝文和汉文按左右行对照著录，既保留下珍贵的少数民族文字资料，又充分展现了编纂者对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视，对贵州民族特性的凸显。

就万历《贵州通志·艺文志》的文化价值而言，一方面，其收录的诗文作品反映了贵州不同时期的自然状况，并对本地人文风俗进行了观照。如吴国伦《赤水苦热》“何青炎蒸候，遨游赤水边。密云浮瘴疠，长日警烽烟”，生动展示出明代贵州的自然生态面貌；又如王守仁《谪居绝粮，请学于农，将田南山永言寄怀》“夷俗多火耕”，记录下贵州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性。

另一方面，“万历志”对保存和传播黔地文学作品起到积极作用，进一步彰显出贵州历史文化资源的价值。志中记载的本地学者治学及著述之状况，可借以审视黔中学术之盛况，亦堪作为辅助材料考察当时学术流派、文学团体的文学交游唱和活动，尤其是其中的酬唱次韵之作，据此能梳理黔地官员及文人学者间的交游情况。如《镇远游西峡记》文末有述“入郡涉，发袖中诗，共得一十六首”^③。又如，田汝成《清平天然洞记》记载：“是岁巡按御史宿松杨伯生，暨清平土夫金事王子升、侯汝言游而悦之，其名则杨伯生命之。又子升、汝言联句咏之，缙绅闻者属而和之，钱塘田汝成记之。”^④

① 张新民：《大一统冲动与地方文化意识的觉醒——明代贵州方志成就探析》，《中国文化研究》2002年第4期。

② 万历《贵州通志·凡例》，《贵州历代方志集成》第二册，第18页。

③ 万历《贵州通志·艺文志》卷二十二，第553页。

④ 同上书，第551页。



悉数同游者身份及相关的创作状况，为理清当时的文化活动事宜提供较为可靠的资料来源。可见，无论是外来的仕宦官员，还是当地的学者文人，两者之间实现了文化学术的切磋互通，亦推动着贵州的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、中原主流文化的互动交流，势必为贵州文化的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。

正如应朝卿序中所言：“名贤所过，其流风余韵，犹足以廉起顽鄙，为山川增色！”^①贵州于明朝永乐十一年（1413年）始建省，又因山川之地理环境的阻遏，长期游离于主流文化边缘，由此，贵州本土的文学创作难免受到轻贱。因此，“万历志”作为地方志书，在收集黔地优秀作品的同时，还选录诸如李白等名人大家的创作，既有标榜本土文化之图，又意在发挥其特殊的文学效应，恰似巡抚赵鈇《凤嬉堂记》中总结的那般：“今九夷内附，悉为郡县，溪洞之民，皆崇礼教，其酋长盘辟罗拜，随群吏抱牍，日趋事不少怠。问其俗，而标枝野鹿之风，犹仿佛近古，其视孔子之时何如？使天下无凤则已，有凤不在中土，必在此无疑！”^②

① 万历《贵州通志·重修贵州通志序》，《贵州历代方志集成》第二册，第10页。

② 万历《贵州通志·艺文志》卷二十二，第539页。